

经济周期 与宪政秩序

王建民
姚中秋

哈耶克 发展之楷模，政策之典范：台湾印象
张曙光 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
高全喜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刘业进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复杂性和系统科学思想
善与自发秩序——华人哈耶克学会网络对话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奥地利学派研究

第三辑

经济周期 与宪政秩序

王建民
姚中秋 主编

Business Cycle and Constitutional Orde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 王建民, 姚中秋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奥地利学派研究; 3)
ISBN 978 - 7 - 308 - 07635 - 7

I. ①经… II. ①王… ②姚… III. ①奥地利学派 -
研究 IV. ①F091. 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9671 号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王建民 姚中秋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华鲁印联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25
字 数 316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635 - 7
定 价 4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编 辑 说 明

2009 年 8 月 3—4 日，华人哈耶克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山东威海召开。在此我想代表全体与会者，感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所提供的便利，尤其是王建民所长和冯克利教授，为筹备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

年会的与会者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本辑中所收多数论文即是会议论文。不过还有一些文章，是相关学者于会后撰写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文代表了国内致力于奥地利学派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水准。

这些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济周期研究。当会议正在筹备与召开期间，全球陷入金融动荡，中国经济也出现明显衰退。而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精粹就是商业周期理论。朱海就博士的论文展示了经典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在主流学者看来，这种理论比较极端，但极端很可能正是它深刻的地方。

第二部分是政法理论研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从这一点上看，奥地利学派是斯密的真正继承人。这一点在 20 世纪奥地利学派两大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身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所关注的乃是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问题。

这种学术取向是由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理论架构决定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及其创造精神。只要企业

2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家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经济自然就能实现增长。只要制度合理，技术、资本乃至组织等其他增长理论所确认的增长的要素，都可以由企业家自行创造出来，或者予以改进。因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正道就是去除那些抑制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因素。

这样的理论进路，对当下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高全喜教授和姚中秋的论文都论述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因此，中国学人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当代学人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西方学人可以进行纯技术性讨论，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但中国学人面对着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恐怕应当投入相当精力思考各个领域的基础性制度问题。具体到经济学，中国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应当讨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制度如何安排。2009年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凸现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进路的必要性。

本辑论文的第三部分讨论的是经济学理论问题，刘业进博士的文章运用复杂性和系统科学理论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进行了阐发，而冯兴元研究员及王建勋博士的论文则大体上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

本辑中收录了哈耶克一篇文章的译文。哈耶克与中国还是有一定缘分的。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学生，周德伟。周德伟曾经运用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设计经济政策；他也曾试图依据哈耶克理论，实现自由主义价值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他的部分论著已经分别收录在大陆出版的两本著作《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和《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当中。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委员会任教的时候，又有一位中国学生，即林毓生先生。同时，哈耶克也曾于1965、1966和1975年三次到台湾地区访问，奥地利学派研究第二辑《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刊登过吴惠林先生的一篇文章《哈耶克在台湾》，对此有详尽叙述。这里刊登的就是哈耶克在结束第一次访问后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虽短，但可以看出

哈耶克关于增长的一些基本想法。

本辑新开设了一个栏目“笔谈”。华人哈耶克学会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纯粹的学术爱好而于2005年成立的一个松散的组织。这个学术共同体建立了一个邮件组。平时是冷寂的，但也许某一天，某个话题会突然引发大家的兴趣，形成热烈的讨论气氛——这大概也属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吧。过去两年中，大家围绕着传统与制度变革、节制资本、善与自发秩序等三个话题，曾经展开过三场热烈的对话、论辩。其中《何种资本？谁来节制？——华人哈耶克学会笔谈》（李华芳整理）已经发表在《南方论丛》2009年第4期上。这里则收录了几乎与其同时发生的另一场对话《善与自发秩序》。

这个邮件组上的讨论是即兴的，因而与论文不同，对话缺乏清晰的条理。因为这种即兴性，学者们很可能在对话中说出某些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不会说的话，但这些话很可能恰恰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有心的读者可以由此看到学者们的不同言说、思考风格，并发现某些具有启发性的洞见。当然，如果这是一场对话，那就不可能有结论，也不应当指望有一个终结。

理解中国，理解哈耶克以及新自由主义，恐怕也需要这样一种心态。2009年也许是思想学术演变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过去30年被认为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时期，而哈耶克被列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行列。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则被很多人认为宣告了这个时期的终结。确实，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诸多明显变化。由于中国经济较快复苏，“中国模式”论也风行一时。

但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果真过时了吗？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提问：人们真的理解哈耶克了吗？被归入新自由主义谱系中的哈耶克，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但这显然是一个被简化了的经济学家形象。同时，哈耶克还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简而言之，哈耶克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这在20世纪是相当罕

4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见的。也正是这种跨学科性，让哈耶克的思想足够复杂、丰富。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论工具，也许就在哈耶克关于法律、政府的思考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本辑收录的论文中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姚中秋

2010 年 1 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 1

特 别 推 荐

发展之楷模，政策之典范：台湾印象

F. A. 哈耶克 / 1

经济周期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

张曙光 / 10

——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提出的问题

张旭昆 / 31

经济波动理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互补

朱海就 / 46

危机、复苏与制度失灵

政法理论研究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高全喜 / 64

试论现代中国的“普通法问题”

姚中秋 / 80

文化主权与民族命运

魏甫华 / 118

合法性重塑与我国公民参与的实践机制

苏振华 王玮 / 131

经济理论研究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复杂性和系统科学思想

刘业进 / 169

认知理性：“基因—谜米”协同演化的视角

李华芳 / 208

2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对传统的“把握”：刻画传统的要点及基本型态

朱宪辰 申瑜絜 / 222

宪政与发展：一个初步考察

王建勋 / 248

财政联邦制：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

冯兴元 / 301

书 评

认知行为视角下的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述评 章平 李妍绮 / 335

《物价与生产》的经济学贡献

冀志罡 / 348

笔 谈

善与自发秩序

——华人哈耶克学会网络对话 刘业进 整理 / 360

特别推荐

发展之楷模，政策之典范： 台湾印象

F. A. 哈耶克 著 黄冰源 译

原编者^[1]按：过去数年里，有关发展政策的文献汗牛充栋，报刊文章也不在少数。以下这篇文章最大之特点在于其从关键细节入手，记述了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这些文字又出自一位极其关注事物发展基础的国民经济学家之手。他就是当代伟大的自由主义学者，知名作者；他出生于奥地利，在英国和美国工作和教学；1962年，他回到弗赖堡大学任教。

数月之前，美国政府宣布，鉴于中国台湾当局已经实现其既定目标，因此将停止对其提供经济援助。这条消息意义非同寻常，本该引起诸多注意，可惜应者不多。要知道，“经济援助”达到并且超过预期之目标，以至于不必进一步经济援助，台湾是第一个案例。如此特殊的发展，理应让更多人知晓。从诸多层面考察，台湾运用的方式方法都颇具楷模意义，堪称发展之楷模，政策之典范。台湾向世人明示：只要政策合理得当，短短12年间，哪怕置身于大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同样的因素条件下，取得的成就照样可以非

[1] 本文原刊于1965年11月20日的《法兰克福汇报》(*Frau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同一般。对于那些驶往中国台湾的道路上，到处看到令人丧气、贫瘠缠身的印度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台湾的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盏明灯。即使先前已有中国香港令人目眩的发展神话，台湾地区崛起的耀眼光辉都是无法隐没的。

从某些角度看，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面临着的阻碍和难度极为严峻。首先，中国台湾的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仅次于荷兰；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这个地区（其面积大约等同于德国巴登州）有 $\frac{3}{5}$ 的地域是高山峻岭的话，那么其人口密度当属世界第一。其次，中国台湾的自然人口增长率（1952 年为每年 3.68%，1964 年仍为每年 2.88%）位居世界第二，稍逊于委内瑞拉。在 1945 年前的 50 年间，台湾地区一直属于日本殖民地。日本人治下之台湾，整个状况虽不至于极端恶劣，但全岛之发展完全是为了向日本提供粮食。二战给这个小岛带来灭顶之灾，战后台湾物质基础极度匮乏。最后，在 1949 年，这个当时人口已达 800 万的小岛不得不接纳 100 多万名大陆民众，以及 50 多万名始终处于戒备状态的军队力量。

大陆的知识精英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些特殊的不利因素又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具备的有利因素。首先，从大陆出逃至台湾的人员中很大部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政府官员、科学家、实业家，这个一直以来处于匮乏、落后状态的殖民地突然一下子涌入如此多精英分子，而且新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风俗上基本相通（例如，台湾至今仍有 $\frac{4}{5}$ 的高校教师来自大陆）。自然，初来乍到的摩擦与阻隔不可避免，但随着新移民因年龄增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代取而代之，移民与本地人的后裔因接受共同的教育和类似的成长道路，隔阂终于不断消融、解除，当地居民甚至因此展现出其理解、适应的一面。

讲到优势条件，我们不得不从纯经济角度来审视以下问题：在政治上，国民党当局虽然形式上实行民主政治，但一党制以及蒋介石个人的绝对权威表明这是一个专制的威权主义政治，施行的是一种以能干的技术官僚为主导的官僚体制。但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当时从各地——尤其是地方政府、农村经济合作社——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一种由下至上、逐步推进的努力举措，这些都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由此，台湾（除金门、马祖外）作为唯一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省份，甚至发展成某种双重政治中心：一个是台北的国民党领导下的，另一个是位于台中的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台湾。而后者显然比国民党当局更具备民主政府的特质。

1949 年国民党退离大陆后的几年里，台湾经济极度萧条，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尽管如此，到了 1952 年，台湾生活水平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之后的 12 年见证了台湾飞速发展的步伐：1952 年至 1964 年间，台湾人口增加 50%（从 800 万增长到 1 200 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 135%，人均收入增加近 60%。年均总收入增幅达 7.3%，1964 年更是达到 10.6%，而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1964 年的人均收入增幅甚至达到 7.3%。

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应当归功于当局为获得粮食丰产而采取的充分利用市场自发秩序力量的政策，它并不着意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而主要在于促进农业生产。除了那些传统的农业领域外，当局特别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交通设施、水利和能源、化肥产业，以及农产品加工行业（例如保鲜和存储）的投入。这当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就都值得详细记述，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截取其中某些片断。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12 年间，学生数从原来的 120 万增加到 300 万，教师人数由 39 000 人增加到 99 000 人，实际接受教育的学生占所有应入学学生的 97%。发达的城市道路网络，以及令人惊叹的密集的公共交通系统，即便最为偏僻的边远村寨都被纳入其中。一条最初出于战略因素考虑而设计的、尔后迅速建成的道路横

4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穿台湾岛中部中央山脉，不仅成为公路建造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也为日后吸引大批旅游者奠定了坚实基础。提起旅游业，我们注意到，面对当时已相当可观的大批旅游者的涌入、主要是美国旅游者，台湾地区许多中小型城市都能提供条件先进的酒店和旅馆，即使与日本堪称行业楷模的酒店业相比，其规模和质量也毫不逊色，甚至连某些欧洲的旅游胜地都不禁艳羡。能源方面，电量产能从原先的 14 亿千瓦时跃升至 59 亿千瓦时，其中约 2/5 的电力来自于水力发电厂，这些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在提供巨大电能的同时，又兼具灌溉和洪水管控的功能。化肥产量（全岛）在短短 12 年里近乎翻了五番。当然，台湾并非自由贸易乐土，即使岛内需求较之前有成倍增长，但在许多非台湾本土产品的进口方面仍有诸多限制。

历史地看，农业经济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来自于 1949 年至 1953 年台湾大规模推行的土地改革。当然，这场土地改革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回避的必然性，但从全局看，这场改革效果之积极、成效之显著，堪称最富实际成效的土地改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成功案例。之所以称其具有必然性，不仅因为它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核心政治纲领，而且还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极度关注，在海峡两岸激起强烈冲击。因为只有通过农业和土地改革，国民党才能获得占台湾本土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支持，从而与共产党影响力抗衡。

巧妙的土地改革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1949 年，农村阶级矛盾尖锐，为消除农民的极度不满情绪，当局决定实行土地改革，而新出台的改良政策虽略显激进，却又十分必要。先期政策包括：规定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年收成的 37.5%。鉴于此前产量最高的土地的地租往往要占到总收成的 50% 以上、甚至有时要超过 70%，因此，这项政策的出台，不仅强制剥夺了土地所有者（地主）的部分财产，而且将矛头直指那些拥有最为肥

沃土地的地主。但正如之前已论及的，该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可回避的政治必然性，而且它为之后两项更成熟的措施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一，当局大规模出售土地，地价与米价绑定，十年还清；第二，征购大地主土地，地价的 70% 以大米（或甜瓜）形式支付的定息长期实物债券补偿，10 年还清，其余 30% 则以当局拥有的工业企业股票方式支付。同时，购买者也可以用大米每半年支付一次，分 20 次还清。而这些支付方式到 1962 年几乎全部支付完毕。

土改之前，只有 34% 是自耕农，经过这场土改，64% 的农民从原先的租赁耕地变成完全拥有土地。整个农业经济中，只有 14% 的农户属于佃农。这种情况下，当局根本无需再将土地进行小单元的划分。农民们只要其家庭情况允许，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土地，而那些被征购的地主们也可保留 3 公顷稻田或 6 公顷旱地。如果土地能保持极高的利用率，则每个农民每公顷的平均收成将相当可观，至少在那些受惠范围较大的区域内，农民们住着精致、漂亮的砖瓦房，物质、文化生活堪比当时中欧某些不太发达的地区水平；总而言之，这里的农民显示出不凡的商业意识，以及足以让欧洲农民赞叹不已的市场适应能力。

继土改之后，声势浩大、波及面广阔的教育与信息运动随之而来，并很快为精明的农民带来了收益。事实上，岛内用来种植主要农产品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然而，土地亩产量却逐年提升，大米和甘蔗的耕地每公顷产量可分别提高 47% 及 45%，其他诸如甘薯、大豆、香蕉、菠萝等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在大幅提升。适宜的气候条件、密集的耕种方式，特别是人工肥料的广泛应用，使得土地基本保持在一年三耕状态，有时甚至能达到一年四耕。在众多新引进的农产品中，蘑菇种植因其发展迅猛而独树一帜，1964 年的出口额（出口单位：听）超过 1 600 万美元。

台湾农业能取得如此骄人成就，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The Joint Commission for Rural

6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Reconstructing, JCRR)。该委员会前身是 1948 年大陆建立的中美合作机构，自 1949 年后，则担当起制定农业政策的主导机关。委员会以中方专家为主，美方专家为辅，着重为那些已引发局部关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只有当实验方法在局部地区得到验证后，才会大规模地推而广之。该委员会曾在某次新闻报道中自豪地称赞这种“由点到面的解决过程”是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提升农民阶层生活水平的大规模项目中，那些最早只应用于局部的手段措施往往将成为整个项目的核心部分。

当然，我们还必须感谢农复会在保留统计信息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珍贵的、许多同类型国家和地区无法实现的完整数据，才让后人了解到台湾地区农业经济的真实发展过程；尤其在制造工艺、土地和水资源储存、害虫防治、农业信贷业务等领域，农复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此外，农复会积极推动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它们不但将有效推进农民的技术和经济教育，而且在社会、政治关系中——例如人口出生率控制方法的有限广泛传播——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

12 年间，农业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也同样在工业领域进行着。在人口增加 50% 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了 10%，同时，农业经济领域的就业人口从 61% 减少为 54%，贸易顺差增大，糖和大米占出口总量份额从原先的 78% 降至 33%，未加工和已加工的农产品总量从 96% 压缩至 60%。这些数字表明台湾农业生产已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传统农业正渐渐淡出，以轻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正不断崛起。

以上这些工业发展成就主要源自私有企业。虽然当局试图创立公营工业企业，并且在化肥、石油提炼、铝业制造等投资新建了巨大的公营厂房和设备，以期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然而当局同时又在系统化推进其终极目标：将这些企业改制为私有化。事实上，12 年间，尽管当局投资新建了那么多工厂，但公营企业占全行业的比例仍从原先的 60% 缩减为 30%。私有企业促成了这个全新产业的

大发展，而且本土企业大多选择与一些大型的美国、日本企业合作，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德国康采恩集团的身影。而造就那些新的大企业成长的重要有效因素——正如先前已提及的——恰恰是当局为补偿那些被征购的地主们，而给予他们的早期公营工业股份。原先的大地主们不少都成为成功的商人，而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动人造纤维、塑料、玻璃板、胶合板、水泥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领头羊。此外，棉产品、五金、机械、化学工业以及电力设备制造等产业也在短短的 12 年间，从一无所有发展壮大成整个岛内最大的贸易出口行业。

纵观全局，台湾发展基本遵循了“轻工为主，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但对汽车工业稍显仓促的投入，却是最大的一个例外。单以岛内的市场需求，根本无法实现企业赢利；而作为汽车产业支撑性基础的现代钢铁业又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当局的决策似乎有违经济规律。然而全岛的发展态势让当权者开始思考发展自有的现代钢铁业。作为整个自由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当局在位于台湾地区南部的高雄港大兴土木，标志着这里将成为澳大利亚北部矿产的加工基地。而同日本、德国大集团的谈判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当局希望通过厂房及设备建造，能引进最新的国际技术，在有效范围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考虑到当时甚至还有计划发展造船业，那么选择汽车行业至少能让人期许更多。

当然，台湾经济并非绝对自由化，但整个市场和价格体系却在良性地运转中，而某些阻碍因素——主要集中在外汇和外贸，以及某些台湾特有的市场特征（例如台湾是唯一不销售可口可乐的非共产主义社会！），也在慢慢出现松动。当局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虽然担任着极重要的角色，而一旦形势发展到达巅峰，当局也希望变官僚主导为市场导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当局只用了较少的资金就实现了它伟大的纲领：只征收了 20% 的 GDP（主要通过关税和间接税收），虽然其中大约一半资金用于了军备支出。在这段令人关注的时期中的前八年至十年间，美国的资助自然起到了举足

8 经济周期与宪政秩序

轻重的作用，有超过 40% 的进口或资本来自美国。但到了后期，美国的经济支持力度明显回落，而且其经济支持也主要通过实物形式实现（例如农业的剩余产品）。而今年上半年美国完全终止了经济援助，至今也未对中国台湾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东南亚的导师

中国台湾在短短 12 年间从一个贫穷落后、几乎只靠两项农产品艰难度日的弹丸之地，发展壮大为东亚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工业快速崛起，城市化进程效果明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认真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周边那些极度贫困的东南亚国家，而它们的自然条件又如此相似，就更不得不引发人们深思。尽管如此，西方社会似乎并未关注到这个现象，而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铺天盖地的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台湾的文字；人们只能在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文件上得到一些信息。相反，中国台湾成功的农业政策却引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极大关注，过去几年中，不仅东南亚国家，甚至有不少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邀请台湾代表团，为当地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和咨询。如今，中国台湾咨询团的活动早已超出农业经济领域，不久前，他们还应邀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授其在技术、小企业、医药和兽医以及渔业方面的经验。

如此频繁的向外输送咨询经验，与台湾地区本土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领域中高端人才的迅速成长密不可分。而其中，德国的影响力显得尤其突出：在台湾地区一所农业技术高校中，大多数教授都曾留学德国。中国台湾对德国的好感也奠定了双方未来经济往来的坚实基础。如今，德国已成为中国台湾第三大主要进口国（虽然其进口额只占位居前两位的美国和日本数量的 1/10），以及台湾出口的第六大订单国。

综上所述，台湾向世界展示的成功理应也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